

雪垠創作集第三種

牛全德與紅蘿蔔

姚雪垠

懷正文化出版社



雪垠創作集之三

牛全德與紅蘿蔔

姚雪垠著

懷正文化社出版

種三第集作創垠雪

牛全德與紅蘿萄

著者 姚雪垠

發行人 劉同績

發行所 懷正文化社

上海江蘇路五五九弄九十九號A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十五月初版

正元

幣國價定冊每

這部小說的寫作過程及其他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杜甫——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我從老河口去鄂北前方，在路上一個人非常無聊。常常，無精打彩的騎在馬上，望着單調的冬的原野，默想着各種問題。我是北方人，愛北方的豪放性格。這性格雖然粗野，但却率真；雖然任性，但却硬爽；雖然有時候對人很不客氣，但却能見義捨身，濟人之急，決不會落井下石或錦上添花。因為有這種偏愛，我在無聊的旅途上，寂寞的馬背上，總想着寫一部描寫這種典型的小說出來。在我的故鄉，和我所熟悉的游擊隊中，像這樣的人物是很多的，在我的心中就有着活的影子。將這種性格和另一個小心謹慎、自私心重的性格相對照，就格外的顯明和凸出。經過了幾天思考，兩種人物都在我的心中構成了雛形。這是我在這次旅行中懷孕的孿生子，後來我將大的

起名叫牛全德，二的叫紅蘿蔔。二月初我回到河口，不久就開始寫這部小說。這時，我正寫「春暖花開的時候」，所以寫「牛全德與紅蘿蔔」就成了附帶工作，進行得非常遲緩。這一年是敵人的空軍活動最兇的一年，除常常有飛機來河口轟炸和偵察之外，還常常有大隊飛機從河口的上空或附近飛過，去轟炸大後方各大城市，或附近幾百里內的重要地方。常常有好些天不僅白天我不能安穩的坐在屋裏，連夜晚也得奔跑。尤其當月明之夜，更難安枕。在這些緊張的日子裏，白天，我帶着很粗劣的一疊稿紙，墨盒和毛筆，恹恹惶惶的躲在郊外，往往一整天不能夠回去吃飯。在郊外，我走進村莊去，向老百姓借一張小矮桌，沒有桌子時就借一把小椅子，放在草棚或樹蔭下，在上面攤開稿紙，然後我蹲在地上，俯着上身，艱難的寫了起來。飛機一來，我趕快捲起稿紙，躲進麥地或胡豆地裏；飛機一去，我拍一拍身上泥土，繼續再寫。因為桌子又小，又低，又不平，加之野風不時的吹動稿紙，更增加寫作的艱難。「牛全德與紅蘿蔔」的大部份原稿，都是在這樣的情形下，一段一段的，斷斷續續的寫出來的。

除上述的艱苦之外，中間還有一次狼狽撤退，幾乎我和我稿子都沉入漢水裏邊。因為在前方生活是這樣不安，所以「牛全德與紅蘿蔔」初稿的漏洞很多。前半部寄出之

後，因為生活不安定和重慶的刊物因轟炸不能出版，下半部就停下來，一停就是半年，到第二年的二月尾才能脫稿。等我寫下半部的時候，因為要趕快完成牠，就只好想法取巧。起初將稿子分上下兩部，不過是為要在中間的故事進行上來個跳躍，好省去許多筆墨，所以那樣的分法實際上是不應該的。關於人物方面的漏洞也不少，如寫「壞女人」的轉變遺漏了一個「過程」，寫紅蘿蔔的心理忽略了「矛盾發展」，寫牛全德本來有一隻手槍，而後來隔幾章就把這手槍忘了；不僅忘了牛全德的手槍，我甚至將張有才（初稿是王有才）這個人物也忘了。漏洞都出在下半部，正是因為寫下半部時我的生活更不安，這不安特別是在精神一方面。大家應該都記得，一九四〇年的冬天是抗戰陣營第一次公開破裂的黑暗期間。那時我害了一場大病，在停屍間裏住了好些天，每次從昏睡中醒來，望着窗上的陽光，總覺得那陽光將永遠離開我了。在養病期間，戰區當局對我下了「逐客令」，我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究竟大病前還是在大病後我完成了「牛全德與紅蘿蔔」，早已經記不清楚。但雨風是那麼逼人，氣壓是那麼低沉，冬季是那麼嚴寒，大地是那麼動盪，叫我如何能細琢細磨的寫作啊！

不僅我本人在戰地遭遇劫厄，我的稿子在重慶也同樣不幸。原來印刷所遭了轟炸，

稿子也隨同蒙難。起初以爲全被炸毀了，後來蓬子兄從灰堆中找出來大部份，另一部份則杳無蹤影。所以在「抗戰文藝」上刊出的「牛全德與紅蘿蔔」只是殘稿，中間的殘缺處刊一段編者聲明。後來重慶某書店所出的小說選本，其中有「差半車麥稭」和「牛全德與紅蘿蔔」，後者仍然保持着殘缺貌面。「牛全德與紅蘿蔔」也出過完整的單行本，不過因印刷惡劣，錯誤很多，加之我決心修改，第一版賣完後就絕跡了。

在抗戰八年間，用一種解嘲的口吻說，我是年輕一輩小說作者中比較「幸運的」一個。我的「幸運」有兩方面：第一是我竟然有資格被胡風派特別重視，當做了文藝戰線上的主要敵人；第二是我的每一部小說發表或出版後都能夠引起讀者的相當注意，並不依賴批評家特別提拔。這兩方面是互相關聯的，正如老子所說的『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牛全德與紅蘿蔔」在重慶發表之後，正如當年「差半車麥稭」在香港發表之後的情形差不外，在全國青年中獲得了很多讀者，幾乎到處都在談論着這部作品。然而胡風先生在默沉着，這沉默叫做「默殺」。爲着忠實於事實起見，我不必以虛偽姿態來一套客氣。不管「牛全德與紅蘿蔔」的成敗如何，在當時被國內廣大讀者羣的偏愛或重視則是事實。在恩施，報紙上曾有論戰，有人說牠是怎樣了不起的作品，有人說牠是羣

仿蘇聯的名著「毀滅」，於是後一派就遭受前一派的批評謾罵。在河南，一個流亡的省立師範因爲不容易獲得後方的鉛印本，就由同學們集資用石印把牠翻版，讓牠在接近戰地的山中流傳。在重慶，有兩個大學裏的文藝團體曾開會討論牠；有一位山東青年連着在「蜀道」和「青光」上發表過兩篇或三篇批評，因爲他讀過好些遍，批評過不止一次，所以那熱情就特別感人。我隨便的舉出來這些事實，並非要來一個自我宣傳，而是要拿這和胡風先生的沉默作個對照。兩年後胡風派在「希望」上將「牛全德與紅蘿蔔」帶着嘲笑的一筆抹殺，只看胡風先生起初的沉默，就可以悟出來其中消息。

九四四年的春天，「牛全德與紅蘿蔔」遇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嚴肅、最使我感激難忘的批評。這次批評是採取討論會的形式，並沒有文章發表，至今我珍貴的保存着當時在幾張紙片上記下的批評要點。參加這次討論的有茅盾先生，馮乃超先生，以羣兄，克家兄，S Y兄。克家兄和S Y兄因爲沒有來得及細讀，爲慎重起見很少發言。以羣兄，乃超先生，茅盾先生，都發表了許多極其使我心服的寶貴意見。他們說出了這部小說的成功之處，也詳細的指出了牠的缺點。特別使我感激的是茅盾先生。他的眼力是那麼不好，這部小說初版本印刷得是那麼一場糊塗，爲了要批評這部書他竟耐心

的細讀兩遍，請想一想這態度是多麼認真，對一個後進是多麼誠懇！自從這一次批評之後，我就決心依照他們的意見進行修改。修改也許比創作更苦，但作品發表之後便屬於社會的，作者對社會負有責任，這種責任心常常在鞭策我，鼓勵我，提高了我的決心和勇氣。因為當時正忙於寫「春暖花開的時候」，修改的工作無暇進行，所以第一版賣完後，我就狠心讓牠絕版。我在重慶是全指望自己的版稅過活的人，停印一本書就說明我是多麼的甘心去服從公正的批評。後來像「春暖花開的時候」那些書我都有心停印整理，但出版家要顧及血本，我的交涉都沒有得到成功。只要日子稍久，我一定不會辜負善意的批評和熱誠愛我的讀者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底我由重慶市移居北碚，生活不安定，心情也不佳。在北碚我開始抽工夫整理「牛全德與紅蘿蔔」，但整理了一萬多字，我就去三台教書，後來就一直沒再繼續。正在這時候，胡風先生所領導的小宗派向我展開了大的攻勢。關於胡風先生隔論上的法西斯毒素和機械論色彩，以及他對中國民族文化的毫無所知，對人民生活的隔膜，他的剛愎的英雄主義和主觀主義，這一切不配做好批評家的弱點我今天都暫且不談。今天，我儘可能把問題的範圍縮小，以討論與「牛全德與紅蘿蔔」有關的問題為主。

至於關於「春暖花開的時候」的部份，保留在將來該書的一篇序文中去詳細的向他們請教。我今天把問題的範圍儘量縮小，並不是要對胡風先生留什麼忠厚，而是今天正是我們大家都不能自由呼吸的時候，胡風先生縱然處處要樹立小宗派，要關閉起現實主義的大門，要破壞文化界的聯合戰線，但我承認牠除上述種種弱點外還畢竟有他的戰鬥力量，還有他的某些貢獻，在沒有朱砂的時候紅土也是可貴的。當胡風派向我展開攻勢的時候，他們決沒有想到我在基本上還可以做一個忠實的「同路人」，決沒有想到我在這艱苦的時代中也有直接和簡接的屑微貢獻，決沒有想到我一直是在遭受着黑暗勢力的打擊和迫害。胡風派把我錯看成他們的主要敵人，恨不得我立刻死去，不惜以種種造謠誣蔑的方法對付我，在當時我有點傷心，現在想起來覺得滑稽。我雖然有一個倔強的性格，但一直沒想過用胡風派的方法報復胡風派。我對胡風派的作風雖極痛心，但我明白我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真敵人，那就是黑暗勢力。所以我期望將來他們會放棄了狹隘的宗派主義的作風，會不再以誣蔑的態度對付文化戰線上的患難朋友。我決不嫉妬他們成功，更絕對不希望他們毀滅。

在胡風派的「希望」第三期上有一篇題為「市僧主義底路線」的文章中，痛罵過我

的「差半車麥楷」以後，緊接着罵我的「牛全德與紅蘿蔔」說：

其後，姚雪垠先生又寫了「牛全德和紅蘿蔔」。這種寫作方式——生活方式的繼續。大約是受了不負責任的讚美的緣故，姚雪垠先生發展了他的這種道路了。牛全德是兵士，紅蘿蔔是農民，兩種性格的刻劃，諸如此類。但那農民，仍然是不停的吸着烟袋——技巧，也顯得窮窘了。但我想特別提出來的是牛全德嫖女人的那一段。作者描寫了性交的姿勢，響聲等等——大約這是寫實主義吧！作者又諷那墮落的女人聽了宣傳隊的宣傳而轉變了，說：「女人一向是受壓迫的，現在我要過新的生活了！」

可愛的先生們，向理論八股儘情的鞠躬吧、

胡風派在別處好像也罵過「牛全德與紅蘿蔔」，但因為我一時借不到資料，只好暫作懸案。如今只就上引的一段文章討論討論，希望胡風派的朋友們能夠平心靜氣的聽一聽我的抗辯。

首先，胡風派的批評家將我的這部小說的題目看錯了一個字，雖不重要，但也是一個疏忽。在英文上「和」或「與」都是「and」一個字，在中文上却大有分別。這分別不在意思，而在平仄。「牛全德與紅蘿蔔」在英文上只有三個字，在中文上却有七個

字。我決定用「與」而不用「和」，是要在幾個平聲字之間換一個仄聲字，求聲音有變化，有變化才有諧和。再者，「和」與「紅」發音的部位相同，二字連續便拗嘴，換一個「與」字就沒有拗嘴的毛病。因為胡風派的批評家在寫批評的時候太不冷靜，太不虛心，所以才有此疏忽。連我的書名字就沒有看清楚，內容當然更不用提了。

其次，胡風派的批評家說：『牛全德是士兵，紅蘿蔔是農民，兩種性格的刻劃，諸如此類。』我的這部小說辛辛苦苦的費了一年的時間寫出來，胡風派的批評家却只用這一句不負責任的話輕輕的概括了牠的題材和主題，實在是最壞的批評作風。我指責這位胡風派的批評家不負責任，是因為他竟用「諸如此類」四個字將一切問題一筆帶過。既然什麼問題都可以用「諸如此類」一筆帶過，那還有什麼批評可談呢？比如我們讀「戰爭與和平」，也可以說這部書是寫拿破侖侵俄之戰的故事和人物，諸如此類。請想想，這不是一大笑話嗎？至於我的「牛全德與紅蘿蔔」，任何不懷成見、不企圖的誣蔑的讀者都知道牠決不僅止於刻劃性格，牠的主題是表現舊時代的江湖義氣向新時代的革命責任感的漸漸移轉，偉大的同志愛終於淹沒了個人的恩仇。退一步說，即讓這部小說僅限於性格刻劃，只要我刻劃成功，從典型的人物反映出這時代的歷史影子，不也是很可喜

麼？抗戰期中，有些自由的土地上用生產勞動改造「二流子」，認為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牛全德不也是「二流子」麼？從抗日體團中他獲得了改造的機會，終於成爲一個爲民族犧牲的英雄。我刻劃出這樣的性格，有什麼罪過呢？事實俱在，任何不懷成見的讀者都承認我的典型創造是成功的。胡風派的小圈子最好能創造出比我的差半車麥稈，牛全德與紅蘿蔔更大的典型性格，更成功的人物才是，不應該對我這微小的成績滿懷妒意。至於說『牛全德是士兵，紅蘿蔔是農民』，這說法也不夠正確。我寫牛全德的時候，只認爲我是在寫一個典型的農村流氓無產者，並不認爲我是在寫典型的士兵。牛全德雖然幹過十幾年軍隊，但決不能作爲士兵典型看。舊日的軍營生活曾發展了他的流氓性是事實，但即讓沒有這一段生活他仍然是一個農村流氓無產者。胡風派的批評家之所以把士兵和農村流氓無產者混爲一談，沒有透過某一些現象去把握到問題的本質的差異，也許是由於不懂，也許是由於粗心，也許由於太傲慢而不願認真的讀一讀我的作品。但不管怎樣，既要寫批評，就不應該有此情形。我寫紅蘿蔔的時候是企圖寫出來一個相當富裕的自耕農，把他看成是一個具體的、現現實實的典型人物，並沒有把他看成是一般的農民。單說「農民」，是抽象的、空洞的、沒有階層生活的人物。胡風派的批評家

說「紅蘿蔔是農民」，錯了。爲什麼錯了呢？因爲，我所寫的本來是十分具體的人物，經你一說，就變成了抽象的概念了。你既不理解紅蘿蔔，也不理解我的創作企圖和過程啊！

第三，胡風派的批評家說：『但那農民，仍然是不停的吸着烟袋——技巧，也顯得窮窘了。』我自己和我的不懷成見的朋友們，也都認爲我寫的紅蘿蔔沒有牛全德同樣成功，但要說我的技巧窮窘了，却是誣蔑。我一直在繼續豐富生活，學習寫作，技巧怎麼會窮窘呢？關於「牛全德與紅蘿蔔」這部小說的整個技巧，留待後邊再談，如今只單獨的說一說紅蘿蔔的問題。紅蘿蔔在這部小說中是一個重要配角，而不是真正主角。在寫作的時候，我將大半力量放在牛全德身上，少半力量放在紅蘿蔔身上，這是事實。初版本紅蘿蔔的失敗處不在他不停的吸着烟袋，而在他的心理和性格中缺少矛盾，缺少矛盾也就缺少了變化。一九四四年的春天朋友們用小規模討論會的形式批評這部作品的時候，茅盾先生，乃超先生，以羣兄，都有這同樣看法，我當時好像是茅塞頓開，五體投地的佩服。直到如今，我沒有懷疑過他們的這一點深刻意見，所以在修改時竭力來糾正原來的毛病。至於吸烟袋，那是小問題，不能因差半車麥楷吸烟袋就不讓紅蘿蔔也吸烟袋。

我的故鄉是中國主要的菸葉出產地，農民不吸旱烟的實在少見。吸烟是農民的重要享受，也是主要的敬客之物，所以見面時先客氣的讓對方吸烟。這種現現實實的人民生活決定了我的寫作。拿紅蘿蔔的吸烟袋和牛全德的抽紙烟作對照，更表現階層習慣的差異。即讓退一步說，我寫紅蘿蔔的吸烟袋在手法上稍微有重複差半車麥楷的毛病，但這樣的毛病實際上微乎其微，不能拿這來將紅蘿蔔全部抹殺。紅蘿蔔比差半車麥楷更加心理描寫，在手法上是一進步。這位胡風派的批評家不從大處着眼，專想吹毛求疵，很使我覺得遺憾。

第四，胡風派的批評家說：『但我特別提出來的是牛全德嫖女人的那一段。作者描寫了性交的姿勢響聲等等——大約這是寫實主義吧！』這一段我也特別的向讀者提出來，請讀者或翻一翻初版本，或翻一翻如今的修正本，用不着我多說話。我所寫的是一個小小的悲劇場面，並沒有寫性交（即讓寫性交也未必不可，但看怎樣寫法）。胡風派的批評家爲要打天家，爲要剷除他們心目中的「異己」（實際是一個戰線上的朋友），常常不惜用血口噴人。唉，胡風派的朋友們，我確實一向把你們當做畏友，但你們太叫我失望。難道你們真看不懂這一章小說麼？難道你們竟連一點批評的道德也不要麼？對

敵人還應該講作戰道德，何況我並不是你們的敵人！差不多一年半的時間中，你們忽而稱我爲色情作家，忽而稱我爲市儈主義者，任意戴帽子，又稱我的作品爲「倡妓文學」，結果我並沒有被你們打倒。你們的努力只不過爲親者所痛，爲爲仇者所快！

第五，胡風派的批評家說：『作者又讓那墮落的女人聽了宣傳隊的宣傳而轉變了，說：『女人一向是受壓迫的，現在我要過新的生活了！』初版本國中關於那位「壞女人」的描寫有成功處，也有嚴重的失敗處，在前邊我已經說過。關於「壞女人」的失敗處是忽略了轉變過程，匆匆的讓她由「落後」跳到「新生」。但，真出我意料之外，胡風派的批評家竟然又離開了我的作品胡扯！這位批評家的意思並不是責備我忽略了寫一個人的轉變過程，而竟是責備我寫她竟也配轉變，這不是笑話麼？唉，笑話還更大呢！這位批評家所引的那一句話，我在我的原作中找了三遍，四遍，五遍，竟然找不到。何必這樣的卑鄙栽誣呢？朋友們，我被你們肆意栽誣的回數真不少，假若你們還有一點點良心的話，也應該感到慚愧了。

第六，胡風派的批評家說：『可愛的先生們，向理論八股儘情的鞠躬吧！』這句話顯然是嘲笑那些曾經稱讚過我的作品的先生和朋友們，不過也指出我是依照着理論八股

從事創作的。這問題讀起來牽涉的方面太廣，既然有我的作品在，我還是暫且不談吧！

根據上面的分析，證明胡風派對我完全失去了批評的公正立場，只是在罵街罷了。他們對這部小說除誤解，造謠和誣衊之外，既不曾指出牠的真毛病，更不肯有一個字提到牠的優點。他們以爲別人喜愛這部小說盡都是向理論八股鞠躬，而沒有想到別人不盡是那麽低能，一定是看出來這部小說雖有毛病，也有牠的值得喜愛的地方。我本來常常想來一個自我檢討，但爲胡風派如此囂張，我不得不採取防衛，暫不赤裸裸的分析我自己的短處。等將來胡風派的作風改變後，我一定會檢討我自己的作品的。如今，既然胡風派的批評家說我的「技巧窮窘了」，我就順便泛泛的談一談這部作品的技巧問題。

我寫這部作品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企圖，卽是儘可能的將牠作爲一部素樸的散文詩來寫，所以在結構上並不很注意。在創作上我有一點自信的地方是對於北方口語的提鍊，這不僅依賴於活語彙的搜集工作，還要對民族的舊文和人民的生活習慣都有相當的瞭解才行。這一點我確實下過工夫，用過心血，請胡風派的朋友們尊重事實，不要嘲笑我在此吹牛。「差半車麥楷」技巧的成功處大半在此，而「牛全德與紅蘿蔔」是牠的繼續和發展。當執筆寫「牛全德與紅蘿蔔」的時候，我正在溫讀陶詩，得到了一點啓示，似乎